“王土”制考辨

李 则 鸣

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制度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和类型?这是古史分期问题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任何一种分期都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或客观标准,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下,严格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对“王土”制作一综合性的考辨,纰缪不伦之处,望同好赐正。

一、从“公社”理论谈起

马克思主义的公社理论,在本世纪2、30年代曾被怀着不同政治倾向的研究者用种种猜测臆断把水搅得混浊不清了,虽然不断有人研究,并有专著作了系统的清理^①,但关键问题至今未得澄清,这里仅就与本文主旨有关的两个问题略抒刍蕘之见

(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云:“亚细亚的……”到底何所指?先看译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处使用“亚细亚”一词,但此处只能理解为“古代”(奴隶制经济形态)之前的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理由有二:1,无论从逻辑或历史的顺序看,均只能作如此解释,此点显而易见,早在2、30年代即已有人指出过,毋庸赘述。2,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划分是以他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理论基础,从世界历史的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演进系列,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提出来的经济形态学说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用列宁的评语说:“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③。因此,此处的“亚细亚”,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或理论体系来看,也只能视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代词,至于为何使用这个代词,则是由于当时“关于社会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无人知道”^④。当时所知道的只是亚洲地区,主要是印度尚比较典型地存在的、以土地共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共同体,马克思把它作为古代社会之前的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从当时的精神生产条件来说,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后人感到困惑不解而横添枝蔓,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则全是由于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和当时的学术条件所造成的。众所周知,直到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借助于摩尔根“在北美印第安人底血统联系中找到了一把钥匙”,“解开了古代希腊罗马及德意志历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最重要的谜”^⑤,从而明确了人类社会最初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而不是过渡阶段的农村公社。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过的农村公社也作了进一步的科学

的论述，如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⑥

或以为“次生形态”既然包括奴隶制与农奴制，则原生形态社会向奴隶制过渡或向农奴制过渡当是两种平行的发展道路。这种理解我认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形态学说的科学原理和历史实际的。马克思此处的断论，无疑是两种历史情况的科学概括，一是普遍的、由原始社会形态向奴隶制社会形态的过渡。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由原始社会形态向农奴制社会形态的过渡，如日耳曼人灭亡西罗马帝国之后，即由原始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农业公社”过渡到了农奴制社会形态。前者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后者则只是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特殊规律，亦如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原始社会形态可以越过几个社会形态直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过渡。不顾历史条件和事物的本质差别，滥用公社理论，只能造成混乱，实无补于历史的科学研究。

(二) 关于古代亚细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亚细亚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之后，对东西方历史作了科学的对比研究。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即已提到“亚洲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最初在欧洲到处存在过”，迨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并改造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发展的规律和它的发展的基本阶段之后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引者按：指农村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⑦。请注意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复信中提到的“过渡的阶段”，以及恩格斯在这里指出的“残余”二字！人们在引用此文时，往往忘记了这个明显的界标而误入了歧途，以致把残余在文明历史中的公社痕迹说成了完整的、原始的社会形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残存于文明社会中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实质所作的科学论断，在他们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三种形式，其中“部落所有制”指的是原始的所有制形式，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则曾存在于古罗马和亚洲地区的文明社会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入木的锐利眼光，透视了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实质是“积极公民的一种集体私有制”，在这种所有制关系中，“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集体私有制”，这是一种多么精确、多么深刻的科学表述！它揭示了希腊与罗马、东方与西方古代社会的共同基础，所不同的只是一种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而另一种则以“集体私有制”为基础。所以，恩格斯说：“在古代的亚洲、希腊和罗马，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⑧。有的研究者忽视了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残余”与“集体私有制”这两个最关紧要的科学观点，以致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从而对史料也作了削足就履的解释。

总之，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历史的研究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原始社会形态未被发现之前，马克思曾以亚洲的、以土地共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作为前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形态被发现之后，对东西方普遍存在过的农村公社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最终得出了科学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发现了古代东方和西方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私有制形式，从而找到了一切文明民族社会历史的共同基础和发展规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经得起东西方历史检验的普遍真理。

二、关于“王土”制与“井田”制的纠葛问题

人们对“三代”的土地制度或称“王土”制，或称“井田”制，二者之异，不唯名称，而尤在内涵。

《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疆土于先王”，即是说“先王”所领的土地与人民是“皇天”付予的，这种所有权的神授观念，无疑即是宗法贵族阶级利用职权篡窃了原始共有制在意识形态上的真实反映，贵族阶级的最高代表——王，就是“民”和“疆土”的最高所有者。《大盂鼎》铭云：“彜(粵)我其適(相)先王受民受疆土”，恰巧证明了《梓材》之言不虚。所以《诗·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公七年也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无怪乎殷王要经常卜问“东土受年”，“西土受年”，“南土受年”，“北土受年”^⑨。

以上所引，足证“三代”土地所有制的本名是“王土”制，其实质是以王为代表的宗法贵族阶级集体私有制，唯因它是集体形式的私有制，所以它必然要有一定的原则，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分配。分配的原则依据是宗法等级。分配的形式则有两种：一种是封地，另一种是份地。前者如《左传》定公四年所云：“聘季授土，陶叔授民”之类，后者如《周礼》所载：“颁田里”或“均土地”之属^⑩，前者是贵族阶级内部的土地等级占有关系，而后者则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或谓“王土”制即是授田制，则仅见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忽视了贵族内部的等级占有关系，尽管反映了“王土”制本质的一面，但仍不免失之偏颇。

“井田”一名，从不见商周甲骨文与金文。周金中常称“田”若干“田”，如《不殿毁》铭云：“田十田”，前“田”指“土田”，即耕地，后“田”为计量单位，即一夫百亩之“田”，如《敌毁》铭之“五十田”，《格伯毁》铭之“三十田”，《卯毁》铭之“一田”等皆是。在文献中，《国语·鲁语下》有“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叁缶米”之语，其“井”亦作计量单位，或谓一井即一夫百亩之地。《孟子》始称“井地”，《谷梁传》“初税亩”条始称“井田”，足证“井田”之名乃后起无疑。且“井田”仅指耕地，而“王土”则包括山川与土田，如《诗·罔宫》所云：“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仅此亦明“井田”与“王土”之内涵迥异。

“井田”之名虽为后起，但井与田的联系可能甚早，窃以为“井”字非来源于井盘之形象，而实起始于田野之局部象形，古之田野是由沟洫、道路、封疆纵横交错所构成的，甲骨文中的田字作田、田、田、田、田诸形，即如实地反映了这一自然形态。《说文》云：“田，……象形，口、十，千(阡)百(陌)之制也。”郑玄注《周礼》云：“立其五沟五涂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说的是田野外形似井，其实如上所述，井字本身即田野外形的局部缩影，故耕字从耒、从井，《玉篇》中有一字更从田、从井、作“𡗗”，或谓耕之初文。如是，则后来称“王土”的耕地为“井田”，虽不无历史渊源，但以“井田”等同或代替“王土”，则无疑是后人的误解。

三、“王土”受田民的组织系统

“王土”中，耕地的划分与受田民的组织系统，在儒家经典《孟子》和《周礼》中，有“八家共井”，“九夫为井”和“十夫有沟”三说，汉唐注疏家以经注经，随文而解，以求调和折衷，如东汉权威注家郑玄云：“以载师职及司马法论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以

诗、春秋、论语、孟子论之，周制邦国用殷之蒞法，制公田不税夫”。又因《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遂谓“邦国亦异外内之法”^①。依郑注，畿内用“贡法”，邦国用“蒞法”，而邦国之内外（即国与野）又异法，这种兼储并蓄，不辨真伪的作法，对于一个忠实于儒家经典的古代注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以现代科学史观和方法辨析之，则孟轲“井地”之言，仅是一种主观设计，并非历史的追述^②，而《周礼》中虽保存了珍贵的史料，但经过后人纂乱或增饰，不作科学的辨析，亦不可能发掘出历史的真实。我们追本溯源，综合地考察了甲骨文、金文、考古和文献诸有关资料，发现一条明显的线索，即古代的民户编制系统与军事编制系统是相适应的，其组织以“族”为核心，受田民即亦兵亦农的族兵。这条线索或是解开儒家经典中诸种矛盾说法，恢复历史原貌的一把钥匙，兹略论述如下：

1. 民户编制系统 《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其中“四闾为族”，即一百家，故郑注“百家为族”。

《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鄩，五鄩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其中“四里为鄩”亦为一百家。

乡、遂总户数均为一万二千五百家。

2. 军事编制系统： 《周礼·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卒”一级为一百人，与“百家为族”相适应，一军总人数为一万二千五百人，正符合“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③之数，足证民户编制系统与军事制系统是完全相适应的。值得注意的是其民户编制自“族”以下，军事编制相应地自“卒”以下，均为以五为公比的等比级数，正说明其组织是以族为核心的。

甲骨文所见出征部队常以“族”为单位，如“一族”，“三族”，“五族”等。常见“登人”也以百人为基数，如“登人百”，“登射三百”，“登千人”，“登三千”，“登五千”，以至“登旅万”等，与《尚书·牧誓》所云：“百夫长”，“千夫长”，《诗·黄鸟》“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御”等均相契合。有的学者论定为“十进制氏族组织”^④，窃以为确切地说应是由军事民主制蜕变而来的阶级社会中的行政与军事组织系统，而从史料的综合考察中亦知其非十进制，而是以族为核心，以五为基数，以五的不同倍数或等比级数的进位法，其中“十”，“百”“千”，“万”，均为五的倍数，《周礼·族师》有“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之组织，其中十为五之二倍，“八闾”乃二族之数。《遂人》：“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殷墟侯家庄大墓所见殉人亦十人一排，1004号墓出土之戈、矛亦十件一捆，其组合同出一辙，可相互印证。至于《周礼·小司徒》中有“九夫为井”，《司马法》中有“屋三为井”之异说，亦如孟轲之“井地”方案，均基于对九方格“井”字之机械设想，既不见其他记载，更与前面所述组织系统相左，其中背谬矛盾之处，即留下了明显的后人臆入，篡改的痕迹。如《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其中“四井为邑”之“邑”，为三十六家，此数别无可考，而文献中却有“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的记载^⑤。古以二十五家为里，四里恰为一百家，疑“四井”乃“四里”之偷换，而“九夫为井”则为臆入。又郑注《周礼·小司徒》引《司马法》：“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匹三十家，士一人，徒三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万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万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其中除“夫三为屋，屋三为井”系三之倍数进位法外，余皆为十之倍数，按其逻辑，“通”一级应为九十家，而非“三十家”；“成”为九百家，而非“三百家”；“终”为九千家，而非“三千家”；“同”为

九万家，而非“三万家”。而“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乃“九夫为井”之异构；“夫三为屋”或为战车甲士之编制，而“屋三为井”，则显系臆入，如改“井十为通”之“井”为“屋”，则“屋十为通”恰为三十家，余皆可通，故凡“井”之属，皆后人所臆所篡，非其本文甚明。

上引资料，或有地域差异，如四进位制或为齐制（《左传》载齐有豆、区、釜、钟四进位制。）但其基本组织系统，则无不一致，而皆不见“九夫”或“八家”组织系统之踪影，尤其可疑的是孟轲之“井地”模式经过汉儒的增饰而益臻完备，如汉初韩婴博士大概嫌孟轲未曾交待“五亩之宅”是在“井”中，抑或“井”外，他依据《谷梁传》所创“公田为居”说，同时牵合“什一”的税率，把公田百亩与五亩之宅，按八家共井之说，重新作了巧安排，即“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各得二亩半。”班固修《汉书》，兼储并蓄，杂糅《孟子》、《周礼》、《韩诗外传》、《司马法》等诸家之言，拼成一“百衲本”，如云：“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同《司马法》之言），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周礼·小司徒》之言），八家共之（孟轲之言），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韩诗外传》之言），这个百衲本，显然破绽百出，毋须赘论。故欲科学地研究“三代”土地制度，必先解除孟轲反汉儒井田说之困惑、干扰，以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为基本依据，综合辨析文献记载，正本清源，庶可还其历史原貌。

注释：

- ① 参见林甘泉等著《中国古代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 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人民出版社1963年单行本，第7、10页。
- ④ 《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附注。
-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
- ⑧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1页。
- ⑨ 《粹》907
- ⑩ 关于份地的分配情况详见《周礼·大司徒》及《遂人》，因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 ⑪ 《周礼·考工记·匠人》郑注。
- ⑫ 参考拙作《孟轲井田说及其相关诸问题探源》，载《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
- ⑬ 《周礼·小司徒》，另外，卜辞仅见师的建制，“罕”为后起，但组织系统一致。
- ⑭ 张政烺：《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载《历史教学》1951年特丛第2卷第3期。
- ⑮ 《诗·良耜》：“百室盈上”、“以开百室”；《左传》成公十七年“百室之邑”；《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千室之邑”等。